

July 2016

## How to Study Literature with "After Theory": Focusing on Eagleton's *Event of Literature*

Yan Su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Sun, Yan. 2016. "How to Study Literature with "After Theory": Focusing on Eagleton's *Event of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4): pp.103-110.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4/11>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理论之后：如何重建文学研究

——以伊格尔顿《文学事件》为中心

孙 燕

---

**摘要：**伊格尔顿《文学事件》一书从文学哲学的层面，对“理论”的衰落及其留下的一些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展开思考，呼吁文学理论研究要尽快跳出后殖民、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樊篱，由政治、文化研究回归文学本身。不过，伊格尔顿并不希望在“理论”之后再度转向“文类”“结构”“原型”等纯粹形式，他不相信纯粹形式可以挽救文学研究。对于有着天主教背景的伊格尔顿而言，新宗教的权威恰恰在于其伦理的而非审美的主张。因此，他致力的文学理论目标是要复活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走出本质主义的无谓论争，以一种德行伦理学的价值理想推动文学研究，在批评理论与分析哲学非同寻常的结合中，开启一条文学理论重建的可能路径，并以此刺激理论再度进行富有雄心的思考。

**关键词：**理论之后； 文学研究； 伊格尔顿； 《文学事件》

**作者简介：**孙燕，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艺学专业，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影视文化研究。电子邮箱：sunyansh@163.com

---

**Title:** How to Study Literature with “After Theory”: Focusing on Eagleton’s *Event of Literature*

**Abstract:** I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Terry Eagleton tries to elucidate on the literary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pertaining to the decline of theory, and calls for a return to literature itself by breaking through the delimitations of politico-cultural studies as in post-colonialist and post-modernist criticism. However, Eagleton does not revert to pure formal research in the “after theory” period as he does not believe formalism can save literary studies. For Eagleton who has a Catholic background, the authority of new religion lies in ethical rather than aesthetic claims. What Eagleton tries to bypass the fruitless debate over essentialism and revive Aristotelian ethical ideas so as to promote literary studies with virtue ethics and to open a way to reconstruct literary theory that is connected with critical theory and analytical philosophy.

**Keywords:** After Theory; literary study; Terry Eagleto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Author:** Sun Yan,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Hangzhou 310018,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contemporary film and TV culture. Email: sunyansh@163.com

---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兴盛，支撑文学研究的种种“大理论”，诸如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等理论体系，日益坍塌瓦解。一时间，“理论的终结”“理论的死亡”“理论之后”“后理论”等各种话语不绝于耳。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的“后时代”，文学研究该何去何从？这也许是关心文学命运的人都要提出的问题。

2012年，当文学研究的关键词依然为“权力”“性别”“身体”“种族”“后殖民”等热门话题时，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却“不合时宜”地推出新作《文学事件》<sup>①</sup> (*The Event of Literature*)，试图在文学活动日益成为文化政治之时重返文学，重新探讨30年前他曾经提出的如今已被各种时髦话题所遮蔽的问题：文学是什么？<sup>②</sup>在我看来，这部著作，是对“理论热”退潮后留下

的一些问题包括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展开的思考,对于建构我们自己的文论话语也颇具启发性。

## 一、回归文学本身

《文学事件》一书的出版,让人记起了伊格尔顿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这一身份倾向于使人认为:无论你怎么迷恋“理论”,<sup>③</sup>最终还是要回到“文学”这个核心问题上来。毕竟,学科自有疆界,文学以外的事情可以交由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来做。不过,伊格尔顿给出的理由听起来似乎更加合乎逻辑:“理论”未能兑现承诺。“文化理论许诺要尽力解决一些基本问题”,但却没有做到。“在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爱、生物学、宗教和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问题上它更多的是沉默无言”(《理论之后》98)。伊格尔顿2003年所讲的一番话,已经为10年后的“转向”埋下了伏笔。对于伊格尔顿而言,“理论”的失效,或许正是返回文学的重要契机。因为在伊格尔顿眼里,文学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往往在“我们的习惯性假设或实践因某种原因而行不通的时候”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可以引领我们)跳出樊篱,并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在做什么?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批评家的任务》177)?的确,文学擅长的是在“理论”之外对我们惯常的实践和生活提出问题,追问意义。文学的这种问题意识与省思能力是否有望解决“理论”未能回答的问题?伊格尔顿对此的态度显然是乐观的,正是缘于对文学的这份期待和信念,他提出了重建文本与现实的辩证法,重建文学伦理的伟大构想(该部分内容将详后)。

由此看来,伊格尔顿一直以来所思考的问题,看似游离于文学之外,其实一直都有文学在场。文学作为一种隐在的视野,与其“理论”思考构成了一种必要的张力,影响着它整个研究过程。因此,《文学事件》一书在伊格尔顿的思想体系中并非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该书所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实际上贯穿了他四十余年的批评生涯。在这种意义上,“返回”或“回归”,对于伊格尔顿,或许并不是一个恰当的表述。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说成是‘返回’,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从未取消对它们(文学问题)的关注”(《批评家的任务》248)。

然而,与乔纳森·卡勒对文学的专注相比,伊格尔顿表现得并不是那么“文学”。他兴趣甚广,关注的问题横跨哲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所以他给人的印象首先是一位博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在这一称谓中,文学是隐匿的,甚至是不在场的。就像他在《理论之后》中直接使用“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而非“文学理论”(literature theory)一词来描述自己讨论的问题一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从事的都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因此他就文学而谈文学的成果并不是很多。70年代末期,几乎还是文学理论的黄金时期,伊格尔顿于同一年出版的两部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和《批评与意识形态》,也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研究,书中关于历史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的论述,远多于“文学性”的探讨。对文学文本的美学分析,或许并非伊格尔顿的强项或兴趣所在,这一点显然与卡勒不同。正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卡勒是一位“很文学”的理论家,始终关注的是文学形式、语言、审美、叙事等方面的“纯文学”问题。尽管他在1982年的专著《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中,曾经使用包罗甚广的“理论”一词来指代结构主义之后的西方文学理论,并大量引介德里达的学说,以期能与那些恪守文本中心主义的形式主义者有所不同,但学界对他的身份命名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而在“理论”已经风光不再的后理论时代,这一纯文学研究者的身份无疑让卡勒有了某种优越感,让他对作为文化理论家和批评家的伊格尔顿常常不以为然,并以“反理论”<sup>④</sup>的姿态与后者针锋相对。而伊格尔顿的回应则是:“反理论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立场”(《批评家的任务》136);我们永远不可能生活在“理论之后”,因为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类生活(《理论之后》213)。

几乎与卡勒的《论解构》同时,伊格尔顿出版了《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1983),这部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著作,虽然开宗明义谈文学理论,但众所周知,这本书是以否定“文学”这一概念和“纯文学理论”的存在为旨归的,鲜明的政治色彩,使该书呈现出一种与卡勒作品迥然有别的理论气质。此后,伊格尔顿在他格外多产的二十余年中,在纯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并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以至于2009年,

马修·博蒙特(Matthew Beaumont)采访他时这样问道：“你的文学批评工作已经到达终点或陷入僵局了吗？”(《批评家的任务》270)?

2012年5月,伊格尔顿带着《文学事件》这部“纯”文学理论著作进入公众的视线,回答了博蒙特三年前的提问。在各种宏大叙事、各种高深理论早已被解构主义大潮冲击得支离破碎之际,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歇尔·伯曼书名)的时候,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伊格尔顿,却重返文学现场,清理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这种“返回”,意味深长。正像他在接受耶鲁大学出版社的采访时所言:“这本书显得有点过时,它在时间上有点错位,它又返回到‘纯’文学理论,而今天‘纯’文学理论已不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时兴。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已被其他的一些发展(特别是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所取代。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关于文学理论的重要问题,包括像‘文学是什么?’这个老掉牙的问题,却被丢到一边,没有得到回答[……]我这本书,就是有意识地返回到那个所谓的‘纯’理论或‘高’理论,就叙事、文学性、虚构、文学语言等提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已被搁置得太久了”(转引自盛宁)。

如上所述,“回归”必然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语境问题。事实上,在《文学事件》一书序言里,伊格尔顿就已经明示了该书与《理论之后》的语境关系。伊格尔顿指出,这本书是从文学哲学(philosophy of literature)的角度对理论衰落的反思。随着左翼政治和激进主义的退潮,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盛的符号学、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等诸如此类的“高理论”,<sup>⑤</sup>日益失去了其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后殖民、族裔研究、性和文化研究(“The event” ix)。这一开场白显然是对《理论之后》的呼应。我们知道,《理论之后》是以“理论”的讣告的面目出现的。开篇伊始,伊格尔顿便不无惋惜地哀叹:“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过去,雅克·拉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都塞、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开拓性著作已经远离我们几十年了[……]之后再没有多少与这些奠基者的雄心大志和新颖独创性相媲美的著作问世”(After Theory 1)。伊格尔顿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称为通俗理论或大众理论的“低理论”时代。在这一时代,高理论以文化研究的形式完成了其世俗化过程。如今,人

们感兴趣的不再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种种类似的主义,而是各种琐碎的、带有“性倾向”的怪异话题。在《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为我们勾勒了这样一幅场景:“讲话轻声细语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们在图书馆里扎成一堆,勤奋地研究着像吸血鬼迷信、挖眼睛、电子人、淫秽电影这样耸人听闻的题目[……]学问不再是象牙塔之事,却属于传媒世界、购物中心、香闺密室和秦楼楚馆”(《理论之后》4—5)。伊格尔顿的这一评判虽然难称公允,但理论的世俗化却是事实。而理论一旦回到日常生活,就很可能失去反思和批判生活的能力,进而走向衰落。新世纪伊始,理论热的消退,英国文化研究中心的关张就足以说明问题。

危局之下,文学研究该往哪里走?其实伊格尔顿关心的并非西方文学正典的存废,而是如何让文学研究回归文学本身,回到那个将文学的自体论视为头等大事的“高理论”或“纯理论”时代,不再把文学视为其他学科的附庸(“把文学还给文学”)。《文学事件》正是这样一种努力,它带着对大众理论的忧虑和对高雅理论的缅怀,重新回到了文学话题,将理论与批评推向新的论战。

## 二、走出本质主义的论争

《文学事件》延续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导论》的主题:何为文学?但相比后者对文学与文学理论给出的判词,该书谈论文学的方式显然温和了许多。这对于文学理论研究无疑是好事,毕竟理论研究需要的不仅仅是激情宣判,还要有冷静的反思。《文学事件》不只是对“理论之后”的反思,也是对30年前那本畅销书的重新审视与反思。

在《文学理论导论》这部影响甚广的畅销书中,伊格尔顿通过考察英国文学的历史起源及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主要流派,最后雄辩地告诉我们: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范畴,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所谓“纯”文学理论实际上只是一种学术神话而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197)。

然而30年后,在《文学事件》中,伊格尔顿又改变了先前的激进立场,不再试图表明文学没有本质,而是努力论证从属于“文学”这一范畴的不同作品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尽管他依然捍卫文学无本体论的统一、无本质性的定义之类的说法,

但却在为本质主义的某些方面辩护。他认为文学作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类属特征,“纯”文学理论作为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对立面也并非虚幻的神话。这种学术立场上的“转身”,虽不免有些尴尬,但于伊格尔顿而言,却是追求真理的需要。为了给文学找到一种合法性定义,伊格尔顿游走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在英美哲学与欧陆理论之间徘徊。伊格尔顿认为欧陆理论和英美哲学分属两个不尽相同的思想传统,前者更加开放,大胆;而后者则显得更为严谨,保守。他形象地说,欧陆理论家“总是敞着衬衫领口”,而英美哲学家则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拘谨地系着领带”(“*The event*” X)。因此,欧陆学派与英美学派在许多问题上的争论其实谈不上孰是孰非,只是思想传统不同而已。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伊格尔顿秉持的是一种激进的、怀疑主义的欧陆理论家的立场,那么到了《文学事件》,他又回到了相对严谨、保守的英美哲学立场上,从文学哲学的角度对“文学”这个已被常识化的概念和定见展开新的思考,重新探讨“文学是什么”“文学理论何为”这样的直至今日依然令人困惑的问题。

按照伊格尔顿的理解,“文学”的概念产生于18世纪末期,是一个动态的发生过程,它存在于持续不断的思想流变和哲学争端之中,与人类数百年的批评观念和理论论争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要回答文学为何物,就必须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文学”这一观念的古老起源。于是,伊格尔顿不得不返回到中世纪“实在论”与“唯名论”关于“共相”(universals)的论争,试图通过对这一思辨传统的梳理来为自己的立场、观点提供一种哲学基础。

伊格尔顿指出,自柏拉图开始,我们就有对于一般概念的渴望,我们倾向于认为一些事物之所以被归在一个词语名下,是因为他们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所以自柏拉图以来的“实在论”致力于求索事物背后的本质或普遍特征。而“唯名论”则与此相反。“唯名论”不相信事物背后有普遍的本质,它重视的是具体而微的个体经验,是事物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因此对“实在论”的本质主义常常嗤之以鼻。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唯名论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从中世纪的唯名论到近代的尼采,再到当代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与左翼政治,这里有着一条隐约可见的草蛇灰线。唯名论成了人类迈向“灾难深重的现代性”的教唆犯,它让我们对世界祛魅之后,离无政府主义、

怀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只有一步之遥(“*The event*” 10-13)。伊格尔顿之所以能够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唯名论”,是因为如今的他已经走出了欧陆理论浓厚的怀疑主义情绪,特别是经历了数十年来理论的风雨浮沉,他对激进的左翼唯名论已经失去了兴趣,认为“唯名论并不是本质主义的唯一可替代性选择”(“*The event*” 19)。他更愿意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看似独断的实在论及其本质主义做一些修正或澄清。比如他说,“本质主义在某些方面可以是开明的”(《批评家的任务》177)。“不要认为本质就意味着恒久不变,它们同样存在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他还说,“并非所有的普遍性或一般范畴都那么具有压迫性,正像所有的差异和独特性不一定是站在天使那边”一样(“*The event*” 17)。在这里,伊格尔顿对“实在论”的辩护,显然针对的是对“普遍观念”“基础”“总体化目标”等充满偏见的各种“后学”。

从哲学角度论证了“本质”的合法性之后,接下来伊格尔顿就进入正题,用长达86页的两章文字开始探讨“文学是什么”。一方面,他像实在论者阿奎那一样,相信“事物必有本质方可存在”(“*The event*” 19),文学作为文学理论的对象,应该具有本质或共相。而另一方面,他又受唯名论的影响,无意指出被我们称为“文学”的事物本质何在。甚至认为,文学并不是本质性的存在物,而是一种具象的存在,只能在经验上予以把握。于是,伊格尔顿陷入了一种深刻的悖论,“文学”一词在他这里成了矛盾修辞法。为了化解这一矛盾,他从自己最心仪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那里搬来救兵,认为维特根斯坦用以研究“语言”的“家族相似”概念同样适用于文学,“它以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方式”,精确地把握住了从属于“文学”的具体作品之间的重要联系(《批评家的任务》177)。

“家族相似”是一个非常通俗的概念,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必然存在诸多相似性,可以是体貌、性情、气质等总体上的,也可以是步姿、鼻子、眉毛等细节上的(维特根斯坦 48)。文学大家族中的个体作品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单一的共同特征,它们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网络”中(“*The event*” 20)。定义文学就是去寻找这些复杂的相似关系。于是伊格尔顿将文学的相似性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虚构性、道德性、语言性、非实用性和规范性(“*The event*” 25)。只要

具备其中的一条或几条,文字就拥有了成为文学的条件。“家族相似”理论似乎以一种更为包容的方式定义了文学,解决了唯名论与实在论之间的对立,既避免了本质主义的挂一漏万,也避免了反本质主义陷入相对主义窠臼,在回答何为文学的问题上,开启了一个富有成效的思考路径。然而,如果以为有了“家族相似”理论,就能讲明白文学是什么,恐怕又过于乐观了。接着伊格尔顿就告诉我们,上述条件并不充分:恰当运用语言、在遣词造句上无懈可击的产品技术手册能是文学吗?即便是虚构作品,也未必称得上文学,譬如“笑话、谎言、广告和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的声明等”。伊格尔顿由此得出结论:“家族相似”理论并没有把“文学”之于“非文学”的特质很好地提炼出来,“它在界定文学的边界上是有漏洞的”,因此“未能得到所有文学哲学家的认可”(“*The event*” 22-23)。

这样绕了一圈,文学仍然是一个无法定义的对象。那么该如何理解伊格尔顿的逻辑呢?如果说他借用“家族相似”理论针对的是哲学史上的本质或共相观念,那么宣布其失效是否就等于承认共相或本质的存在呢?实际上伊格尔顿并非一个立场坚定的本质主义者,他真正想表达的是,“文学或许是一个哲学上的可疑概念,但它仍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批评家的任务》178)。所以他并不会为文学无法定义而担忧。在他看来,定义不见得就是精确地界定对象的本质。文学作为一个“动态的发生过程”,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其本质就如同流动的岩浆,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然而,这又不意味着文学没有本质,就好比我们不能说流动的岩浆不是实体一样。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他“所提出的五个文学特质只是对文学本性的简单描述,是阐明何为文学的大致标准。而正是这种对于文学的粗略描述恰恰成了更为可取的文学定义,无论是对追求确定感的本质主义者,还是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反本质主义者,都是如此”(“*The event*” 32)。在这里,伊格尔顿的立场超越了传统的实在论和激进的唯名论,以一种折衷开放姿态重新定义了文学,走出了文学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这就像济慈提出的“消极感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的诗学命题,能够自由地面对不确定与奥秘,不试图强求有封闭性的确定感。

当然,伊格尔顿并不满足于对文学本体做一

种维特根斯坦式的哲学沉思。在他看来,文学虽然没有本体论的统一,但这并不表示它在实践上或体制内没有影响力。同时“本质主义也不一定就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探究,它同样可以有伦理学的维度,有着基于人类生活的更为深刻的动因”(“*The event*” 17-18)。伊格尔顿以此讨论为文学本质的重构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过渡。

### 三、重建文学的伦理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长期以来对伦理学有着很大的兴趣,从他20多岁时出版的《新左派教会》(1965),到晚近创作的《文学事件》,伦理问题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著述中。对于一个从小就天主教徒或犹太—基督教的观点看世界的人来说,世界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存在。而精神并非一个孤立的封闭的领域,它是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一种伦理。所以伊格尔顿从未离开对伦理的关注,当意识到它给左派带来的尴尬后,更是愈发注重伦理了。<sup>⑥</sup>《理论之后》几乎是以一种宣传性、纲领性的方式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该书的后半部分重新回到《新左派教会》讨论的范围,为真理、德性、客观性、道德、革命、基础、死亡、邪恶、爱等一些过时的人文主义概念恢复名誉,明确表达出要自觉维护伦理—政治的价值立场。

这一立场不能不影响他对文学的理解,实际上《文学事件》可以看作是他从伦理学角度重构文学本质的努力。该书伊始回溯中世纪经院哲学,于伊格尔顿而言,当然不仅仅是对古文化的一种兴趣,也是一种“形而上学”或“神学”的转向。诚如他自己所言:“我一直对研究神学(形而上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感兴趣。我的著作曾一度离开这个主题,但近年以来,我又回到这个主题”(“‘我的平台’” 25)。伊格尔顿自始至终关注神学,是因为他发现神学所具有的解放潜能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异曲同工,也与追求爱、自由、道德生活的伦理学在人文关怀的终极目标上殊途同归。这种宗教与政治情感早在《新左派教会》中就已经表达了出来。后来到了《理论之后》,他又通过为上述一些前现代主义的概念正名,正式提出了伦理—政治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伦理学与政治学密不可分,要追求道德的完善,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行动。伊格尔顿显然是在呼应亚里士多德的

古典伦理学思想,后者认为,伦理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了解德性,而是为了使自己有德性”(亚里士多德 37),而“德性成于行动”(41)。作为对其前期作品的回应,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对于“文学是什么”的探讨不再囿于本体论意义上的本质主义,而是从基于行动的伦理学进入文学内部,在漫长的哲学铺垫之后,正式提出了文学的伦理本性。伊格尔顿认为,“在一个后宗教的时代,文学已然成为了特有的道德范式”,它对人类行为的敏感、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寻以及对于如何富足并自省地生活问题的思考,都堪称至高的道德实践范例(“*The event*” 59)。

在道德变得日益脆弱和陈腐的后现代社会,学院派知识分子大谈文学的道德功能,似乎显得十分迂腐。实际上 20 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经典作品,几乎都是以质疑道德、悬置道德的面貌示人的。那些道德色彩明显的作品,往往被认为文学性打了折扣而遭诟病。然而,“不去探寻人类生活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文学还能存在吗”(“*The event*” 70)? 伊格尔顿令人寻味的质问针对的正是当下文学领域的道德虚无主义。在他看来,文学是一种旨在实现人类自由的道德范式,能否过上有德性的生活,也就是人类独有的一种臻于完善的生活,是文学应负的道德责任。这种已被遗忘的伦理,也是文学得以成就自身的目的。当然,文学的道德目标不是靠浪漫思想家关于政治乌托邦的审美想象得以实现的,所以他并不完全赞同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关于文学想象的学说,<sup>⑦</sup>尽管二者在捍卫文学的道德功能上存有共识。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想象对于一个自由社会的缔造固然重要,但仅有想象是不够的,因为“这样一种主观知识并不必然带来实际的道德行动。施虐狂也许完全可以想象到(皮鞭下)受害者的痛苦,但这不见得会让他停止这种折磨”(“*The event*” 61)。因此,道德想象如何转变为一种道德实践,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一个自由、公义仍被争议的社会,如果文学给予我们的仅是关于恶的“感觉”或对受难者的“移情想象”,那么文学还远没有实现其应有的道德功能。“文学的意义,不是纯粹主观心理状态的表达,而是真实世界的组成部分”(“*The event*” 63)。

伊格尔顿希望文学能够超越社会偏狭的界限,探究那些对全人类至关重要的根本性问题,如爱、善、正义、自由、邪恶、基础等。他之所以对从

纳撒尼尔·霍桑、乔治·艾略特到亨利·詹姆斯和爱丽丝·默多克的文学传统多有肯定,是认为这一传统所构筑的文学道德空间使文学具有了与社会学、人类学共通的美德。伊格尔顿指出,伟大的“文学作品通过揭露我们赖以生存的法则、规范、传统、意识形态和文化形式的专制性本质来完成自己的道德工作”(“*The event*” 103)。好的文学可以是教诲的,明确表达某种道德主张或政治立场并不一定有损其文学性。《神曲》和《仙后》的伟大,不是其文风或词语本身的问题,而恰恰是因为但丁和斯宾塞坚定的派系立场和道德承担。

伊格尔顿像马修·阿诺德一样,认为在宗教影响日益衰退、道德生活日益溃败的年代,文学可以肩负宗教的重任,为人类追寻生存意义提供启示,展现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这种崇高的精神追求不同于那种致力于从人类生活中抽取道德判断或道德律令的道德主义,而是一种基于行动的“德行伦理”(virtue ethics),它通过把抽象的道德判断或知识转化为具体的道德行动,影响并改变我们的世界。伊格尔顿说:“文学作品代表着一种实践的或者行动中的知识,这与古代对于美德的理解是类似的。文学作品是道德知识的范式,但这是在其实践而非理论意义上的判断”(“*The event*” 64)。

强调文学的伦理本性,意味着文学作品作为现实世界之物,不是因为它“模仿”或“反映”现实,而是因为它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建构了现实。伊格尔顿指出,当菲茨杰拉德透过尼克·卡拉威的眼睛描述盖茨比的奢华别墅和狂欢派对时,文学不只是在模仿,更是在构建一个“爵士时代”;当乔伊斯在奥地利小镇写作《都柏林人》时,他也是在“塑造着爱尔兰民族不曾存有的良心”。文学语言的这种“施为性”,是文学得以成就自身的前提。“像美德一样,文学作品有其自身的目的,只有通过它们所意指的言语行为,方能实现这一目的”(“*The event*” 64)。

伊格尔顿借用当代伟大批评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修辞学理论,对文学语言的施为方式做了探究。认为文学活动实际上是“对特定情境的策略性反应”,文学通过仪式、表演、修辞、话语等多种策略(伯克称之为“戏剧主义”),实现与历史、现实的关联(“*The event*” 169—70)。伊格尔顿以《简·爱》为例,分析了夏洛蒂·勃朗特为满足被禁止的崇高欲望所采取的小说“策略”。指出勃朗特之所以留下阁楼上的疯女人,让

简与罗切斯特受尽分离之苦与肉体折磨,乃至最后让罗切斯特变成虚弱的盲翁,孤苦无依,都是为这对不伦恋人终成眷属所做的道德铺垫。作品将哥特小说、神话故事、道德寓言等多种文体结合在一起,通过文本形式策略解决了现实中的道德难题。

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文本具有自指性,但这绝非单纯的语言学问题,它必然受制于既定的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然而文学作品并不把生动的经验简单地转译为法则和规范,相反,文学通过修辞性“策略”建立起文本与外界的联系,为我们提供道德认同的方法。根据伊格尔顿的解释,“策略是有目的的计划”,“它通过运用某些受制于规则的手段,以一种维特根斯坦语法的方式将现实组织成有意义的形式”,并由此重塑文本细读与现实生活的关联。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伊格尔顿把“策略”视为统一不同文学理论的普遍观念、一种存在于文学中的“万有理论”(“*The event*” 225)。

伊格尔顿在批评理论与分析哲学非同寻常的结合中,开启了一条文学理论重建的可能途径。为了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他像卡勒一样,呼吁建构一个共同的文学价值理想。但与卡勒不同的是,他并不希望在理论之后再度转向文类、文学模式和原型等纯粹形式,尽管他一再表明我们应该放弃对于“结构”“系统”“确定性”的后现代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重返形式主义的批评传统。他反复强调,当我们阅读一个文本时,我们不可能魔术般地将文本之外的生活悬置,伟大的文学作品不一定就是要把读者和日常生活间离开来,有时反而是进一步强化我们对熟悉之物的认知。对于有着天主教背景的伊格尔顿来说,“新宗教之权威恰恰在于其伦理的而非审美的主张”(杰弗里 34—35)。因此,他致力的文学理论目标就是要复活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以一种德行伦理学的价值理想重建文学研究。

把伦理问题融入文学研究之中,其实是构成一种美学立场的必要元素。这种立场,在伊格尔顿这里,既不同于形式主义者把作品看作“精致的瓮”,也不同于福柯、德里达把一切文本当作社会历史中的“话语”,而否认文学的自主性。它强调的是,作为策略的文学作品如何与社会生活保持彼此独立但又相互烛照、相互影响的互文关系,并以此刺激文学理论再度进行富有雄心的思考。

## 结 语

伊格尔顿对当代文论的诊断及其开出的药方,能否切实有效地引领文学研究走出疾患?对此我有点怀疑。在我看来,“伦理”不足以从根本上挽救文学研究。当前文学研究的危机在于对文学自身的忽视,只有再度重视作品本身,才有望走出“理论”的怪圈。伊格尔顿著述的表面动机是有感于文学研究的文化主义及由此导致的文学学科权威的沦丧,但他影射的实际问题则是左派对伦理的逃离。因此,他一方面号召文学研究回归文学自身,但又在有意无意的表达中,透露出一种文学之外的政治热忱。这种悖论,或许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难以摆脱的宿命。在他那富有创见的希冀中,他既想让文学对人类的宗教、道德生活负责,又想让其保持优雅的唯一主义,然而文学何以承担如此的重负?同时,与形式之类相比,道德是个变动较大的范畴,往往缺少稳定的标准,那么如何把握文学的这一本质?诚然,当怀疑、解构、颠覆的思维模式已然成为新的迷信崇拜,道德的规训和教诲或许可以成为新的变革性力量,只是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恢复某种平衡,还要再次肯定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 注释[Notes]

① “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这一译名,采用的是国内文论界最初的译介用名。其实正像盛宁先生所言,此译名并不完全合乎伊格尔顿的本意。若把“event”简单直译为“事件”二字,我们获得的只是一个名词性的概念:一件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事件”,而英文“event”一词所含有的处于运动过程中的“发生或正在发生”(“happen, happening, occur, occurring”)的“动作性”含义就消失了,这显然不符合作者的意思。同时把文学与“事件”联系起来,也有点匪夷所思。回到伊格尔顿的书中,“文学的发生”似乎更恰当,也更合乎作者的本意(详见盛宁:“文学,是事件吗?”〈<http://www.rcgus.com/hzcdysbl/383403.html>〉)。鉴于日前河南大学出版社刚刚推出的中译本,使用的也是“文学事件”一名,笔者便在定稿时由“文学的发生”改为了“文学事件”,以求一致。

② 伊格尔顿1983年出版的《文学理论导论》长达14页的绪论标题就是“文学是什么?”。当时他否定了“文学”的存在,认为文学是个无法界定的概念,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本质”。那么被我们称为“文学”的这个概念又是怎么形成的呢?该书显然未能解答这一问题。因此,2012年,时隔30年后,伊格尔顿又重拾“文学是什么?”这个似乎过

时的老问题,对文学的本质重新展开思考,以期能够将这个问题划上一个句号。

③ 根据伊格尔顿的观点,此处的“理论”是指带引号的、大写的理论。它是一个松散的、包罗万象的术语,通常用来指受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而产生的论述人文学科的学术话语。为了区别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中使用的是“文化理论”这一术语。

④ 在卡勒看来,“理论是基于结构主义的,是跨学科、纯思辨的[……]是对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的一些范畴的探索”,它往往把注意力引向文学以外,因而对理论颇有微辞。See Culler, Jonathan.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4-15.

⑤ 在伊格尔顿这里,理论有两个阵营:“高理论”与“低理论”,前者是指20世纪前半叶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结盟而形成的现代文学理论,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等都属此类;后者则是指八九十年代之后兴盛起来的以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如性别、族裔、后殖民研究等。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理论的文化转向导致了文学研究的琐碎化,因此它就好比“高理论”低了一大截,故称“低”理论。所以,他在《理论之后》中所哀叹、惋惜的,并不是整个理论的衰败,而是追求宏大叙事的“高理论”被追求“差异”“边缘”“琐碎”的“低理论”所取代,最后导致整个西方文学理论的衰落。

⑥ 伊格尔顿认为,伦理学是一套古老的颇受敬重的话语,左派的失败是因为忽视了这套话语,他们犯了个致命错误,就是认为伦理学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的学说,与政治无关。事实上,伦理学能够抓住更恰当的政治主旨。在主流的伦理学传统中,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和马克思,伦理学总是意味着政治伦理学。他曾说,“左派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回到伦理,德里达、巴丢、阿冈本、齐泽克及其对真实界的兴趣都显示了这一点”。某种程度上,他将自己回归伦理看作是“试图学会如何对待一个不容延缓的基本问题的努力”。参见《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48。

⑦ 在《自由的想象》一书中,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指出文学想象对于西方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越是在自由主义制度健全的地方,越倾向于相信人性的可完善性,认为道德会伴随制度的改善而变好。See Trilling, Lionel. “Preface,”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New York: NY RB Classics, 2008).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Aristotle. *Ethika Nikomachea*. Trans. Liao Shenba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3.]

但汉松:“把文学还给文学:伊格尔顿《文学事件》”,2013年4月14日<<http://miniyan.com/read.php?tid=2524>>。

[Dan, Hansong. “Return Literature to Literature Itself: On Eagleton’s *Event of Literature*.” 14 April 2013 <<http://miniyan.com/read.php?tid=2524>>.]

Eagleton, Terry.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After The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尚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Eagleton, Terry. *After Theory*. Trans. Shang Z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rans. Wu Xiaom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特里·伊格尔顿 马修·博蒙特:《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王杰、贾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Eagleton, Terry, and Matthew Beaumont. *The Task of the Critic: Terry Eagleton in Dialogue*. Trans. Wang Jie and Jia Ji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大卫·杰弗里:“后理论语境中的文学研究”,《国外文学》4(2007):30-37。

[Jeffrey, David.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Post-theoretical Context.” *Foreign Literatures*. 4(2007): 30-37.]

盛宁:“文学,是事件吗?”2015年4月20日<<http://www.rcgus.com/hzcdysbl/383403.html>>。

[Sheng, Ning. “Is Literature the Event?” 20 April 2015 <<http://www.rcgus.com/hzcdysbl/383403.html>>.]

王杰 徐方赋:“‘我的平台是整个世界’——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文艺理论与批评》5(2008):22-27。

[Wang, Jie, and Xu Fangfu. “‘My Base Is the Glob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Terry Eagleton.” *Theory and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and Art*. 5(2008): 22-27.]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Wittgenstein, Ludwig. *Philosophy Research*. Trans. Li Bulo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责任编辑:王嘉军)